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

李世洞

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美国对中国历史现状的研究发展十分显著。它的历史凭借与现实背景是什么?这种发展的大致轮廓如何?它具有那些重要特点?本文仅提出一些看法。

(一) 历史的凭借

美国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进入19世纪,商业资本开始侵入中国,到中国的海船日趋增多。1968年,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主席演词中曾说,“有整整一代的时间,对纽约人和波士顿人来说,到广州和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为容易,更加赚钱。”^①经济的需要产生了研究中国的需要,发展较早的欧洲东方学又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美国的汉学逐渐兴起。最早的所谓汉学家是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1830年,裨治文(Brindgman, E. C. 1801—1861)来到广州,1832年创办了《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报导中国历史、现状、民俗、政情,成为美国最早的汉学杂志。据美国学者白瑞华(Brinton, R. S.)介绍,该杂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以及它同美、欧的关系具有重大史料价值。1833年,卫三畏(Williams, S. W. 1812—1884)也来到广州任公理会印刷所经理,协助裨治文编《澳门月报》,后继任主编。他于1876年回国后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与裨治文合编过《中国基督教研究》(1841),自著《简易中文教程》(1842)、《中国地理》(1844)、《中国总论》(1848),因此他被尊为美国汉学的奠基人。为美国汉学填石筑基的还有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1827—1916)、明恩溥(Smith, A. H. 1845—1932)、狄考文(Ma-teer, C. W. 1836—1908)、卫斐烈(Williams, F. 1857—1928)等人。

1842年,裨治文、顾盛(Cushing, C. 1800—1878)等人建立了美国东方学会,其宗旨是“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②这个学会开始出版了《美国东方学杂志》,其后又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书》。该学会以研究中国为主,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组织上成形的标志。

美国内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更加迅速发展,要求系统地培养远东及中国问题专家,以满足其扩张需要。从70年代起,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设立了东方学或汉学的教研机构。1876年,耶鲁在卫三畏主持下建立了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次年,哈佛开设汉语讲座。1869年,美国通过其驻北京使节以西文图书换得中国的《皇清经解》、《五礼通考》、《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性理大全》、《梅氏丛书》等共934册,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批中文藏书。1879年,哈佛通过其中文讲师戈鲲化收集中文图书。1875年,耶鲁获得早期留美学生容闳的赠书。这

些都成为美国汉学最初的资料基地。总之，19世纪美国的汉学处于草创阶段，虽有发展，但“远远落在欧洲后面。”^⑨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扩张特别是向东方的扩张要求更为强烈。1898年，美西战争夺得菲律宾后，次年炮制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积极扩大其在华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为其创造了有利时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更加明显地发展起来了。到40年代初，更多的以中国为主的研究机构和讲座建立起来了。1901年，耶鲁大学出现了雅礼协会(Yale-in-China)；同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中文讲座；1910年，芝加哥大学开始收藏中文资料；1920年，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语文、历史课程；1925年，美国太平洋学会成立，出版《太平洋事务》、《远东观察》、《远东文摘》及有关中国的专著；1928年，哈佛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28及1929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两次召开研究中国促进会议，制定收集资料、培养人员、出版图书的规划，建立了促进研究中国常设委员会；193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东方研究系；1934年，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亚洲研究系；1935年，夏威夷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1936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东方语文系等等。图书收藏也日趋丰富，美国的东亚藏书向来以中文图书为主，1869至1930年只有35万多册，1940年即达约78万册，增长一倍多。一批新的中国研究专家登上学坛，如恒慕义(Hummel, A. W. 1884—1975)、赖德烈(Latourette, K. S. 1884—1968)、韦慕庭(Wilbur, C. M. 1908—?)、顾立雅(Creel, H. G. 1905—?)、戴德华(Taylor, G. E. 1905—?)、卜德(Bodde, D. 1909—?)、费正清(Fairbank, J. K. 1907—?)、拉铁摩尔(Lattimore, O. 1900—?)、傅路德(Goodrich, L. C.)等。一批中国古典著作被译成英文，如《道德经》(1934)、《诗经》(1937)、《论语》(1938)、《荀子》(1928)、班固《前汉书》第一卷(1938)。他们还编著了一些综合概论性的通史，如赖德烈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1934年初版)、傅路德的《中国人民简史》(1943年初版)。这两本书不仅是3、40年代的大学教本，而且至今仍然受到重视。一些专著亦相继问世，如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1922)、马士与宓亨利的《远东国际关系史》(1931)、拉铁摩尔关于中国地域的著述《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1929)、《高鞑靼》(1930)、《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1943年开始出版)等等。

综观二战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绝大多数都是到过中国并从事过传教、政治、外交活动的“一身数任”者。19世纪的裨治文、卫三畏已如前所述。20世纪3、40年代活跃起来的“新人”也多属此类。韦慕庭、戴德华、卜德都于二战中在美国战略情报局担任过职务，费正清不仅在战略情报局当过高级职员，还是1942至1943年美驻华使馆的特别助理兼新闻处主任。拉铁摩尔在二战中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这种状况也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即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与唯心史观。裨治文认为鸦片战争乃出于上帝的神示，开创了美国和中国关系史上的新时代。鸦片战争后，他又为美国专使出谋划策，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卫三畏在其著作中极力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为列强侵略中国辩护。明恩溥在其《中国人的特征》中污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不懂进步。赖德烈在其著作中用基督教的观点伪造中国历史，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第三个特点是20世纪3、4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已超出了上1世纪的汉学传统，即狭隘的宗教、语言、文学内容，翻译考证古典作品的研究方法。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初至1944年，比较重要的历史著作中，宗教、语言、文学方面的有13种，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却达43种之多。这些著作绝大部分都是根据作者的立场与观点进行分析、综合、论述

的。

当然，从总的来看，战前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1958年，费正清在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演讲《歧义注：美国的亚洲研究》中曾指出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影响不巨，人才有限。林德贝克在其《了解中国》(1971)中也谈到机构少、忽视现代研究等弱点。但是，不管怎样，它毕竟为战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凭借。

(二) 战后的徘徊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急剧膨胀，霸权主义成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方针。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的日益高涨又严重地阻碍了美国垄断资本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扫清道路，美国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历史现状的研究。美国中东史家凯迪曾说：“美国对第三世界历史的兴趣是随其政治与经济利益而来的……1945年以后，美国的利益成为全球性的了，与此同时，政府各机构与各基金会提供地域研究资金，鼓励对第三世界进行考察与研究。”^④于是，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研究。这一趋势在美国大学世界史课内容的变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长期以来，美国的“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欧洲文明史”，亚非拉地区的历史或者根本没有，或者是“蜻蜓点水”。在1903—1917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有九种根本不写东亚，一种只写了10%的篇幅。1944年的七种世界史教科书，第三世界的历史共占7%^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开始承认他们应该研究各重要地区的历史”了^⑥。于是，开设“真正世界史”课的大学逐年增加，1946至1947年有14所，1951年为25所，1970年竟达到312所。1974年，美国历史协会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亚非拉历史现状为研究方向或对其有兴趣的会员竟占总会员的13%^⑦。这是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以来几乎未见过的情况。

对中国的研究也同样有所发展。如美国各大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捐助”在1933至1945年的13年中仅有741,047美元，而1946至1958年的13年中则达3,478,448美元，增长近4倍^⑧。到50年代中，设有中国语言和地区教研规划的大学已达17所^⑨。1948年，加强了远东学会的力量及对《远东季刊》的出版工作。1956年，又将其扩大改组为亚洲研究学会，刊物也改名为《亚洲研究杂志》。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二战后的10多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受着干扰，发展并不十分显著，而且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二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执行着一条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路线。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专家巴尼特(鲍大可)在70年代回顾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在50年代，美国官方的看法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长不了的现象’，应当把北京政权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并从外部对它不断施加压力。”^⑩用费正清的话说就是“不与毛泽东打交道从而把他搞垮”^⑪。在这种反动路线下，1950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年8月通过了麦卡伦法，接着麦卡锡主义流行。在这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迫害中，研究中国的组织、团体和人员都受到冲击。美国太平洋学会自20年代成立以来，出了1200多种包括中国在内的著作，保存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但是，这些却被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以“阴谋影响民主党执政时国务院的决策人去同情中国共产党人”^⑫的罪名全部抄了去。“中国专家一般都被调到别的地区，有些被开除，有些则辞职了。”^⑬连那些政治上的中间派，甚至拥护美国内外政策的学者也“在劫难逃”。曾于1949年被国务院邀请参加美对华政策研讨会的拉铁摩尔、费正清即其一例。前者以犯“伪证罪”受到起诉，最后被迫离开美国，后者竟也受到怀疑与冷

迁。费正清在回顾这一点时不无嘲解地说：“自1949年以来我是美国太平洋学会的一个理事。我被布登兹在华盛顿‘指控’为共产党人，并且是一个所谓亲共阴谋中的‘坚强的核心’的一部分。”^⑭结果已确定的亚洲研究学会主席一职无法到任。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政治气氛中，对中国的研究显然受到干扰。美籍华人中国史研究者黄宗智说：“在弥漫美国的反共风潮下，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几乎完全中断。”^⑮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郝克欧(Hucker, C.O.)在1958年也说道：“中国是重要的世界文明国家之一，有着连续不断的比任何国家更长的历史，但是在不久以前，美国历史(界)几乎没有注意中国历史的研究。”^⑯这从美国研究中国的博士论文占世界这方面博士论文的比重可以得到印证，1945年至1951年平均占63%(最高一年占80.7%)，麦卡锡主义流行后的1955至1956年下降到41%。

此外，这十多年的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首先，19世纪的汉学之风，似又有抬头之势。文献的翻译，资料的编辑考订重新流行起来。50年代出版的重要译著有德效骞译的班固《前汉书》第三卷、赖肖尔译的《园仁日记》，魏鲁男(Ware, J.R.)译的《孔子语录》，舒尔曼从元食货志摘译的《元朝经济结构》等等。一些机构与学者也译编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如华盛顿大学远东俄国研究所主持翻译了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史料。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史学家韦慕庭编译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日文资料》、《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中文资料》、《关于1918至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件》，胡佛研究所诺思编译的《苏俄与东方：1920至1927年，文献考察》。中国等国家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英文，如法国学者葛乐赛(Rene Grousset)的《中华帝国的兴起和它的辉煌成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李剑农的《1840—1928年的中国政治史》等。

其次，离现实政治比较远的领域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主题。这一时期关于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又多了起来。重要的有顾立雅(Creel, H.G.)的《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芮沃寿(Wright, A.F.)的《中国思想研究》，尼文森与芮沃寿合写的《行动中的儒教》，费正清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芮沃寿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陈荣捷(Chan, wing-tsit)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最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是1954至1956年3年中一连出了七本论述中国大学的书。

第三，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官方史学”控制着史坛。严格说来，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以“官方”为主，但在二战以前，它还是各学派中的一派，二战后这十几年情况发生了剧变，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公然宣称自己搞的就是“官方史学”，他们“位尊势大”，从学术角度上为美国当权集团进行辩护，出谋划策。这在费正清1958年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及其他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不仅公开表明其研究就是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服务的，而且在书中露骨地鼓吹台湾独立，用“两种文明的冲突”解释中国近代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被说成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给中国带来了好处。英法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是对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的反抗^⑰，治外法权“既不是一个外国的制度，也不是现代的发明。中国政府在中世纪就曾经要求寄居海口的侨民，在他们的头目和本国法律下来管理自己”^⑱。他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的沿海贸易与外交》中提出“华夷共治论”(Synarchy)，认为中国自辽金元以来就有了外族参加统治的作法，清末西方列强对中国海关权力的攫取是完全符合这一“共治”传统的^⑲。他的这套“理论”在美国影响很大，黄宗智也承认是50年代中国研究中的主要流派。

美国政府50年代敌视中国的政策使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存在着大量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点。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列举了鸦片战争、19世纪中期的“叛乱”、维新变法运动、中日、中美关系等方面的七处薄弱点与空白点。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正如他承认的那

样，“共产党中国……仍是处在美国政治科学掌握之外的难于理解的题目。”^②50年代出的一些有关新中国的书籍，相当一部分出自新闻记者等非专业人员之手，多是报道，印象记一类的东西。至于一些称得上学术研究的著作也“只是些表示数量的经济研究，对于制度的系统描写，和……笼统论述。”^③如华克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连费正清也不得不承认它“提供了一幅从外面观察的比较阴沉可怕的图画。”^④这样，必然使美国处于“现代中国盲”的状况。费正清已看到这一点对美国统治阶级是极端不利的，他说：“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剧变，中国社会的变革，在美国几乎是不知道的。”“恐惧掺杂了无知”，而“恐惧和无知只会导向灾难。”^⑤他这里的所谓“灾难”显然是指这种无知不能使统治集团制定出更有效的对付新中国的行动纲领，“没有这种了解而径自行动是自寻灾难。”^⑥因此，他大声疾呼“对于中国人民的过去经历和最近的革命，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明晰扼要的看法”^⑦，这就需要“认真从事研究”^⑧。1959年，他又在亚洲研究学会的主席演词中指出对中国研究非常不够，“不能集中注意他们当前的革命”^⑨，费正清的这些言论预示着美国的中国研究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迅速的发展

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国孤立新中国政策的破产，使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费正清所说的“灾难”的严重性，美国政府开始了加强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扶持。

1958年，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根据此法自1959年起至1970年止美国政府为中国研究拨款1500多万美元，各大基金会在此期间也提供经费3000多万美元（仅福特基金会就“捐助”2600多万美元），各大学提供约2000万美元，共约7000万美元，比1958年以前的13年经费增加19倍。亚洲研究学会1958年从福特基金会只得到6358美元资助，而1968年则得到38000美元，增加了5倍以上。

1959年，福特基金会提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协调、推动全美的中国研究。根据这一方针，它支持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是年在纽约召开了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大会，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组成了以中国问题专家、国务院及国会代表为主的领导机构，设置了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府和政策、中国法律、中国经济等专门委员会。它在1961—1970年间资助研究现代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项目共108个。1963年和1966年福特基金会又资助建立了研究中国文化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些组织对于推动全国的中国研究都起了重大作用。例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66至1970年的五年间组织了130次讨论会，请费正清等中国问题专家作各方面的学术报告^⑩。研究中国文化委员会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与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一起召开了优先考虑中国研究规划会议，提出要在中国研究作为“全国性的事业”认真抓好。

此外，福特基金会还大力资助一些大学设立研究中心，开设有关课程。它先后选择了哈佛、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伯克利）、西雅图华盛顿、密执安、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康奈尔、斯坦福等10所大学为重点支援对象。

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也亲自出马进行鼓动。1961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号召为反对所谓新中国及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加强历史研究。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小施莱辛格也参加该协会的年会，并作了《史学家与历史》的报告。

至于中国问题专家更是积极在各种场合发言撰文继续强调研究中国。1961年，当代中国

联合委员会领导成员、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所长戴德华著文提出：“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迫切的问题”。1964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博伊德主席在演词中强调“对中国的了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精神上的和实际上的要求”^②。1968年，费正清又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主席演词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的迫切性，并引用中国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证明他的这一主张。

从60年代起，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

50年代，美国有13所大学设有中国问题或以中国为主的研究中心，到60年代末，已增加到50多所，其中大部分是研究当代中国的。连哈佛这个汉学传统十分浓厚的老中心自60年代开始，也设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和通货膨胀”、“共产党中国的国民收入”、“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等研究课题。研究中国的人才成倍增长。1960年，以近代中国为主课的研究生仅有100人，到1970年即达700人，如果加上兼学古代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生则有1700人之多。1960至1969年间获博士学位者412人，获硕士学位者1000人，初、中、高级的中国问题研究与教学人员共达3100人，其中专职教授就有600人。50年代共有博士论文377篇，60年代则有887篇，增加1倍多。60年代研究中共党史的博士论文有27篇，而50年代只有3篇。

各学会成员的兴趣与活动及刊物内容也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1974年，美国历史协会对会员进行一次调查，发现以东亚（主要是中国）为研究方向或对其有兴趣者的人数仅次于研究拉美史者（这里不算研究欧美史者）^③。1977年，亚洲研究学会对其4000名会员进行函询，研究中国者即达1400人之多，研究日本者只890人，研究印度者只有550人^④。亚洲研究学会历届年会内容一向以中国为主，60年代则更加突出了。1960—1971年的8次年会中就有54个中国专题（其中现代方面38个，近代8个）^⑤。这期间已知的5次年会主席演词中就有三次是谈中国问题的。1962年年会有中国专题讨论11个，其中近现代及中国与外国关系就有9个，如《现代中国研究》、《共产党中国的最近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的精髓》、《美国远东政策》、《海外华侨》等^⑥。甚至一向不大注意中国研究的美国历史协会，进入60年代以后也改变了态度。它在1961年、1962年、1965年等届年会上都设置了中国专题。它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自1961年至1971年共刊登有关中国的论文19篇，有时一期刊载3篇之多，这在它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亚洲研究杂志》刊登的关于中国论文的比例也不断增长。第20卷（1960—61）共发表论文25篇，论述中国方面的只有4篇，第28卷（1968—69）共发论文37篇，有关中国的为17篇。美国的《当代史》每年9月出中国问题专号。1960年创刊的《中国季刊》^⑦更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1964年曾全文刊登我党1927年10月—11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7、13两期的内容，1971年第二期还登载了《伊罗生与马林谈话记录（1935）》、《李德回忆录》，1972年发表了《陈独秀未写完的自传》，1973年第3期登了关于林彪垮台的论文。

60年代以后的大发展，还表现在资料的收集与加工、史学动态的研究介绍方面。1959年，福特基金会在制定中国研究规划时，就把建立资料中心，收集加工资料作为重要措施。各全国性组织、各大图书馆、各研究学会及研究中心也都十分重视这一点。国家科学基金会在60年代初曾拨出专款出版中国资料目录《共产党中国连续出版物、科学技术、医学及部分社会科学国际联合书目》，共收录资料864种。亚洲研究学会1959年成立了东亚图书馆委员会，开展收集工作，1963年它还通过哈佛大学的艾文博（Irick, R. L.）在我国台湾设立了“中文资料和研究辅助服务中心”，同时在华盛顿也成立了一个中文资料中心，由华人学者余秉贵负责。

在年会上也常设资料问题专门讨论会，如1978年年会上就有“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资料与方法若干问题”讨论会。1968年，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倡议发起建立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71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又在香港设立了以收集中国资料为中心任务的大学服务中心（1980年停办）。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又在优先开展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中提出建立一个为中国研究服务的全国性图书馆。据有关资料介绍，到70年代中美国已有95个各种类型的东亚图书馆，藏书总量已由本世纪30年代的30多万册增加到1975年的670万册（中文图书为400万册）。国会图书馆是美国中文资料的最大收藏中心，1980年的图书已达46万册，中文期刊8000多种，缩微胶卷7600卷。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被认为是仅次于国会图书馆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两个“圣地”。哈佛东亚图书馆在1965年以后加强了对中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现藏有大量关于国共两党的各种文献档案。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在60年代也派人到世界各地收集中国现代史资料，收藏中重要的有1923年中国共产党内各类文件，延安时期出版的整套解放日报等。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发起建立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专门复制我有关当代问题的资料，70年代初已复制了《红旗飘飘》1—16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中央局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1948—1970年《人民日报》索引、《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全部文章。1974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持出版了《现代中国社会书目》，据出版者称“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汇集了有关中国的著作目录表”，该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汇编了1944—1972年用西文出版的中国问题著作，第二册汇编了1944—1969年用中文出版的图书，第三册汇编了1944—1971年用日文出版的图书，共3100多条目，书目9万多种。每种著作均有简明注释，并注明出版者、时间、地点、主要内容、现在收藏地点等。参加编纂者120多人。斯坦福大学也于60年代出版过二卷本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书目，有1200多种。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也非常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亲自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著作，主要有郝克欧的《中国史书目评介》（1958）、芮沃寿的《中国文明的研究》（1960）、汤姆森的《美国的中国学，1830—1920》（1961）、费维恺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史学》（1961）、芮沃寿的《今日之中国研究》（1965）、芮沃寿与霍尔合著的《中国和日本史学最近发展趋势，1961—66》（1967）、傅路德的《中国研究新近的发展》（1965）、费维恺的《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刘广京的《从封建主义到皇权地方主义：美国关于中国历史某些新著中的见解》（1978）、黄宗智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1980）等等。这对于研究者们及时掌握最新发展情况、促进研究工作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方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史学思潮出现了多元化。60年代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出现了新左派政治运动。与此相适应，史学界出现了史学新左派，这在中国研究方面也反映出来了。即聚集在亚洲研究会内的一批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政治态度比较激进，反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台湾国民党的军援。在学术上，这些人激烈批评与否定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官方史学，指出它的要害就是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辩护、为美国现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寻找依据，提供策略。埃德加·史诺曾说这一派学者摆脱了风行一时的冷战卫士所固有的成见与偏见。政治上、学术上与保守派的分歧最后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68年，在纪念亚洲研究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12个大学的青年教师、研究生350人退出，并于次年建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仅一年的时间会

（下转第90页）

⑦⑬ 李冰若：《栩庄漫记》，转引自《花间集评注》。

⑧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第178页。

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532页。

⑩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第365页。

⑪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⑫ 况周颐：《蕙风词话》。

⑬ 《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⑭ 《词话丛编·灵芬馆词话》。

(上接第106页)

员即达1000人，以后又发展到5000人，出版自己的杂志及各种著作。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们象其他领域的新左派史家那样，强调“从下往上”的研究原则，即把着重点从统治阶级、英雄人物身上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来。如华盛顿大学青年女教授裴宜理(Perry, Elizabeth)1980年出版了《从造反到革命：1850—1949年间的淮北地区》，研究探讨了该地区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周锡瑞(Esherick, Joseph)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把着眼点移到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方面，不局限于几个英雄人物。当然，他们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各种激进思想的杂烩，其政治态度往往偏激，而且目前这一派还未产生有份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他们的研究也有简单化的毛病。这一派的出现是美国官方史学危机的结果，而它的出现又加深了官方史学的危机。许多官方史学家在新形势面前也放弃或修正了以前那种露骨的观点。

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中美建交，美国的中国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搜集资料、研究问题，同时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讲学、交流。这必然促进了它的发展。美国研究中国的历史、现状比过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其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尤其值得提出的，它也正在追随“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榜样，打破传统的“单科独进”的研究方法，实行多学科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跨学科方法(interdisciplinary)，从历史、文学、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总体研究。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大学公开提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主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动向。

注释：

①③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载《美国历史评论》1969年第3期。

②⑦⑨ 《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68、209、91页。

④⑥ N.R.凯迪：《穆斯林中东史》，载M.坎曼：《往昔》(1980)，第131、114页。

⑤ 王家骅：《美国研究日本史概况》，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第16页。

⑦⑩ 菲利普·D·柯廷：《非洲史》，载坎曼：《往昔》第114页。

⑧⑨ 林德贝克：《了解中国》(1971)，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4集第133、132页。

⑩ 巴尼特：《美国同中国之关系》，载《七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译文集，第18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文版)，第352、272、273、272注解、115、121、355、353、353、274、5、3、2页。

⑰ 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香港、《抖擞》1980年11月号，第11页。

⑱ 郝克敏：《中国历史参考文献评论》(1958)，译文载《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381页。

⑲ 刘广京：《三十年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06页。

⑳㉑㉒ 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60—1971》，载北京大学学报编辑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与资料》(1973年)。

㉑ J.W.霍尔：《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载前引坎曼编《往昔》第162页。

㉒ 该刊为英刊物，但编辑及撰稿者主要是美国人。